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中共與蘇聯關係的回顧與展望

doi:10.30390/ISC.198301_22(4).0005

問題與研究, 22(4), 1983

Wenti Yu Yanjiu, 22(4), 1983

作者/Author：李登科

頁數/Page：42-5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3/0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1_22\(4\).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1_22(4).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中共與蘇聯關係的回顧與展望

李登科

壹、前言

在中共與蘇聯於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公開決裂以前，雙方曾經在一九五〇年代有過一段十分親密的關係。北平與莫斯科的友好合作關係以及締結同盟這一事實，使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感受到嚴重的威脅。當然，在亞洲地區的非共國家，特別是中華民國、大韓民國與日本，更面臨來自蘇聯與中共的聯合壓力。一九五〇年初期越盟戰爭的迅速升高（越盟乃越南共黨勢力代表，全名是越南獨立同盟，領導者為胡志明）以及同年六月爆發的韓戰，不但顯露出國際共黨對外的擴張本質，也說明了中共與蘇聯聯手後對自由世界所構成的嚴重挑戰。

中共與蘇聯的友好關係同時亦沖淡了國際共黨運動因為一九四八年蘇聯與南斯拉夫的分裂而造成的震撼^①。更具體的說，如果北平與莫斯科的密切友好關係得以繼續下去，國際共黨勢力無疑地將獲得更大的進展。然而北平與莫斯科的友好合作關係，並未如許多研究共黨專家學者們所預測的繼續下去。一九五〇年代後期，雙方關係已經每下愈況，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以後，關係更趨緊張。一九六九年三月，雙方更在珍寶島大動干戈，全面戰爭的恐怖曾一時充滿雙方領導者的腦海。

中共與蘇聯的分裂不僅再度造成國際共黨運動的多極化，也為西方國家帶來一個新的國際戰略局勢^②。前美國總統尼克森因此認為中共與蘇聯的分裂，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最重大的地緣政治事件。尼克森進一步指出，美國所以能夠與中共在一

註① 有關蘇聯與南斯拉夫的分裂原因與影響，見·Adam B. Ulam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1973*. 2nd edition,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4, pp.458-470; Alvin Z. Rubinstein. e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pp.210-213.

註② 讀者若欲進一步瞭解國際共黨運動，請參見 Hugh Seton-Watson. *The Imperialist Revolutionaries*.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78.

九七〇年代初期達成和解，主要原因就是利用中共與蘇聯的衝突^④。

華盛頓與北平的密切交往，包括對抗蘇聯的戰略合作，使美國在「北平、華盛頓、莫斯科」三角關係中獲得相當有利的地位^④。美國國防部也因此把六〇年代的打兩個半戰爭戰略改變為打一個半戰爭，這種轉變表示美國不再視中共為敵對者。

由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確信他們已從中共與蘇聯的衝突中獲得戰略上的有利地位，他們當然也就害怕中（共）蘇一朝和解後可能為西方帶來災難。基於這項考慮，西方研究國際關係的專家學者們從確定中共與蘇聯的分裂後，就轉而注意雙方是否有和解的可能。莫斯科對北平的任何示好表示或北平批判莫斯科的語調與用字遣詞因而都成為研究與分析的對象，而西方大眾傳播工具更是不遺餘力地追蹤各種有關中（共）蘇「和解」跡象的新聞。

到底北平與莫斯科是否有和解的可能？如果沒有，那麼，雙方在今年十月五日恢復的副外長級磋商代表什麼意義？雙方又為何同意恢復會談？這些問題當然值得我們研究，畢竟北平與蘇聯若一朝再度聯手不但將影響到西方的抗蘇戰略，也將影響到我們的反共大業。筆者希望經由本文的撰寫而有助於讀者瞭解這一些重要問題。

本文除前言外將分成四節。第一節扼要說明中共與蘇聯為何分裂以及分裂經過。第二節敘述中共與蘇聯的三種重要談判經過，包括邊界河道航運談判、邊界談判及關係正常化談判。第三節將分析北平與莫斯科恢復副部長級會談的動機和目的。至於雙方未來關係的展望則將在最後一節中予以探討。另外布里茲涅夫死亡以及安德洛波夫（Yuri Andropov）的繼承俄共總書記是否會影響到莫斯科與北平的關係，也將在本節中一併提及。

貳、中共與蘇聯分裂的經過及原因

中共與蘇聯之間的爭執由來已久，有些西方學者甚至把雙方的爭執追溯到一九三〇年代或一九二〇年代。但一般都認為雙方的爭執主要是發生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以後，到五〇年代後期才日趨嚴重，可是當時外界並不清楚這兩個共黨政權的爭執。一直到一九六〇年四月，北平與莫斯科才把他們的爭執向外界透露，不過雙方仍然避免直接抨擊對方。一九六二年底以後，雙方開始互相直接抨擊。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中共的「人民日報」在以「評美國共產黨聲明」為文的社論中提出不平等條約問題，包括一八五八年的中俄璦琿條約及一八六〇年的中俄北京條約。這一篇文章引起蘇聯強烈的反應，在同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一項官方

註③ Richard Nixon. *The Real War*. New York: Warner Books Inc., 1980. pp. 134-136.

註④ 據尼克森總統的說法，由於擔心促使美國更進一步地接近中共，蘇聯政府竟然不敢對美國的大規模轟炸北越（一九七二年五月八日）採取任何明顯的對抗行動。蘇聯仍然歡迎尼克森按原定計劃赴莫斯科訪問。詳見 Richard Nixon. *op. cit.*, pp. 112-113.

聲明中，蘇聯認為中共如果企圖製造疆界問題而染指蘇聯土地，將可能為中共帶來危險的後果^⑥。

隨着雙方關係的惡化，蘇聯在一九六五年開始大規模地增強駐守在中蘇邊界的軍隊^⑦。莫斯科的行動無疑地更引起中共的憤恨，同時雙方在邊界上的軍事對峙也日益明顯。一九六九年三月，雙方終於在珍寶島爆發兩場激烈的邊境戰鬥，互相蒙受到人員及裝備上的損失^⑧。

珍寶島事件是中共與蘇聯關係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在這事件以後雙方都採取新的外交策略企圖孤立對方。北平的外交攻勢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進行和陸政策，希望聯合美國、日本以及西歐的力量來制衡蘇聯。莫斯科的外交對策則是一方面在亞洲提出所謂「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希望藉着這項計劃的實現而孤立中共。在另外一方面，莫斯科極力鼓吹召開歐洲安全會議，企圖透過與西歐的和解來保障蘇聯在歐洲的既得利益，並且避免同時遭受到東西兩方面夾攻的威脅。此外，莫斯科也急着與華盛頓達成和解（*Détente*），目的之一即在防止美國與中共的繼續接近。

爲什麼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會從一九五〇年中期以前的友好親密轉變到軍事與外交上的對峙呢？關於這個問題中外學者專家們的看法並不一致。札格利亞教授（Donald S. Zagoria）認為雙方所以發生衝突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共與蘇聯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革命期望和抱負，爭奪國際共黨運動領導權，以及因爲中共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與反西方帝國主義色彩^⑨。格利夫斯教授（William E. Griffith）則指出雙方衝突的根本原因是中共領導者一心一意想把「中國」建設成一個超級強權，但是蘇聯的領袖們卻致力於防止這種可能性的發生^⑩。史丹福大學的諾斯教授（Robert C. North）提出另一種看法，他說北平與莫斯科由於國力不同，對現狀不滿程度的差異，再加上不同的國家利益與政治文化終於引起衝突^⑪。布魯金斯研究所的包大可

註⑥ Keesing's Research Report. *The Sino-Soviet Disput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9. pp. 110-111.

註⑦ A. Doak Barnett. *China and the Major Powers in East Asia*.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 pp. 48-49.

註⑧ 中共與莫斯科從未公佈傷亡的詳情，但彼此都會透露一些戰鬥情形。有關蘇聯方面的報導參見“Press Conference in the U. S. S. 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ravda*, March 8 1969 (in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ol. 21, no. 10, March 26, 1969, pp. 4-5); “Provocateurs Rebuffed,” *Pravda*, March 17, 1969 (in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ol. 21, no. 10, March 26, 1969, pp. 5-6); 有關中共方面的報導參見“Note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Soviet Embassy in China,” *Peking Review*, No. 10, (March 7, 1969), p. 5; “Soviet Revisionists Create Fresh Incident of Bloodshed by Once Again Intruding Into China's Chempao Island Area,” *Peking Review*, No. 12, (March 21, 1969), pp. 8-12.

註⑨ Donald S. Zagoria.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385-386.

註⑩ William E. Griffith. *The Sino-Soviet Rift*. Cambridge, Mass.: The M. I. T. Press, 1964. p. 4.

註⑪ Robert C. North.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China*. 2nd edition. Encino, California: Dickenson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4. pp. 124-125.

(A. Doak Barnett) 也是一位「中國通」，他的說法是意識型態在雙方的衝突中佔很重要的地位，不過雙方在文化上的差異、政治性因素（包括領導人之間的不同性格、個性和看法）、經濟性因素（主要是蘇聯決定從中國大陸撤回技術人員以及中共對蘇聯其它經濟援助的不滿）、以及領土和安全上的爭執也都是構成雙方對立的因素^①。

辛頓教授 (Harold C. Hinton) 的解釋亦值得一提。據他的研究，中共與蘇聯發生衝突的最主要原因是：1. 蘇聯仍然害怕「黃禍」，認為中國巨大的人口壓力將會對蘇聯的領土造成威脅；2. 由於中國人認為蘇聯仍然佔領着中國的土地，與蘇聯發生衝突有助於中共政權獲得人民的向心力^②。

上面提到的五位美國學者對於中共與蘇聯發生衝突的原因雖然各有看法，但卻各有見地，多少都給我們一些啓示。

依筆者的看法，中共與蘇聯的衝突主要是因為國家利益上的對立，而非意識型態上的爭執。意識型態上的爭論（包括世界革命戰略、和平共存論、戰爭是否可以避免等）其實只是一個最初的導火線，雙方都利用它做爲一種鬭爭的工具，目的則在掩飾彼此真正的動機（目前北平與莫斯科之間已無意識型態之爭，因就「修正主義」及與「美帝」妥協而言，彼此難分軒輊）。

就莫斯科而言，一個可以被其控制的「中國」政府誠然最符合蘇聯的國家利益，因爲這樣的一個「中國」不僅可以保障蘇聯在東方的安全，而且可以讓蘇聯無阻礙地開發中國大陸的各種資源。一個四分五裂的中國也符合蘇聯的國家利益，因爲在這種狀況下中國當然不可能對蘇聯的國家安全造成威脅（蘇聯甚至可以支持某一地區的割據勢力而製造一個親蘇力量）。最不符合蘇聯國家利益的情況是一個統一、強大而又敵視蘇聯的中國，這或許也就是史達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一再阻撓國軍接收東北的主要理由。

毛澤東曾親自說過，史達林是在中共派遣一百萬「志願軍」替金日成保住江山以後才信任中共政權^③。換句話說，一直等到韓戰以後，史達林才認爲中共政權可靠，認爲北平一定會忠心耿耿地聽從莫斯科的指揮。史達林並沒料到中共政權在強化對內統治以後就不再接受蘇聯的指使。因此黑魯雪夫的批判史達林可說正好給予中共一個良好藉口，讓北平脫離莫斯科的控制。尤有進者，北平整肅親蘇的高崗、進軍西藏、發動臺海危機事件以及與印度的邊界糾紛都讓莫斯科感到不安。莫斯科特別感到震怒的是北平於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七年兩度對外蒙古提出主權要求^④。在另外一方面，中共深深不滿蘇聯在臺海危機中的退卻態度（也

註① A. Doak Barnett, *op. cit.* pp. 32-85.

註② Harold C. Hinton, *China's Turbulent Quest*, Bloomington &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206-208.

註③ Stuart Schram, ed.,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4, p. 103.

註④ Tai Sung An, *The Sino-Soviet Territorial Dispute*,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3, p. 68.; Harold C. Hinton, *The Bear at the Gate*,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2, pp. 15-16.

就是自私的作法)、偏袒印度、以及片面取銷核子合作條約、撤回所有的技術專家等等不友好舉動。總之，這種種對立的國家利益終於造成雙方的衝突，而一旦衝突發生，歷史性因素、文化上的因素乃至邊界問題均一一出籠，使雙方的衝突更趨複雜化，難以獲得解決。

叁、雙方以往的談判經過

中共與蘇聯之間的官方談判主要有三種：邊界談判、關係正常化談判與邊界河道航行談判。前兩項談判比較為一般人所了解，邊界河道航行談判則似乎很少被提及。

邊界河道航行談判其實是北平與莫斯科之間最早的定期官方會談。這項會談開始於一九五一年，目的在於解決低水位季節雙方船隻在黑龍江與烏蘇里江的航行問題。爲了處理這些問題，北平與莫斯科特別設立一個聯合委員會，負責雙方的談判。這項談判在珍寶島事件發生後曾一度中斷，但是當年（一九六九）六月十八日又恢復舉行。雖然這項會談並不討論雙方的邊界問題，但是對於緩和雙方在珍寶島事件後的緊張關係卻曾扮演一個相當的角色^⑮。

一九七四年五月廿三日蘇聯宣佈，將允許中共的船隻在通過黑龍江與烏蘇里江的交會處時航經屬於蘇聯管轄的主航道，只要中共尊重蘇聯對該地區的主權以及領土完整^⑯。蘇聯的這項聲明被中共立即拒絕。中共強調說，即使依據不平等條約之一的中俄北京條約，中國船隻也具有權利通過在伯力附近的主航道^⑰。顯然地，蘇聯是想以方便中共船隻航行的條件誘使中共承認蘇聯對該地區的領土主權不料乃遭中共拒絕。

因爲中共拒絕蘇聯的建議，邊界河道航行談判一直到一九七七年以前都沒有具體的結果。一九七七年十月六日，在蘇聯讓步後，中共與蘇聯就邊界河道航行問題獲得協議。依據該協議，中共的船隻在穿越黑龍江與烏蘇里江會流處的時候可以利用伯力附近的主航道^⑱。雖然這僅僅是一項關於邊界河道航行的技術性協定，西方的報章雜誌卻據此大作文章，認爲是雙方友善的象徵^⑲。

註⑮ *Idid*, p. 102.

註⑯ "Note to Peking on Khabarovsk Border Navigation," *Pravda*, May 24, 1974 (in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ol. 26, no. 20, June 12, 1974 p. 4).

註⑰ "Statement by Spokesman of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Peking Review*, June 7, 1974, p. 7.

註⑱ "Meeting on Navigation," *Izvestia* Oct. 9, 1977. (in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ol. 29, no. 41, Nov. 9, 1977, p. 24)

註⑲ *The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9, 1977.

。與這項邊界河道航行談判有關的最近一次協議，簽訂於今（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內容則未見透露。

邊界談判是中共與蘇聯之間的第二種官方談判，其重要性則為眾所週知。根據蘇聯的說法，舉行中（共）蘇邊界談判的建議是它於一九六〇年就提出來的，不過卻遭到中共一再的迴避^②。一九六四年二月廿五日，中共與蘇聯才開始舉行邊界談判，蘇方代表團團長為日里亞諾夫（P. I. Zyrjanov）上將，他曾是蘇聯邊防軍總部的司令官。經過幾個月的會談後並沒得到任何結果，到了八月廿二日，談判竟告破裂。

一九六九年十月廿日，中共與蘇聯再舉行邊界談判，此次為副外長級談判，雙方都希望能藉此以降低彼此在邊界上所感受到的威脅。這個目的是實現了，但是解決邊界糾紛的目的則依然未達成，因為彼此僵持不下。中共認為在進行邊界談判之前，莫斯科應先承認當前中俄國界線是沙皇時代帝俄迫使中國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所造成的。其次，北平聲明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國根據不平等條約割去的中國土地，但違約侵佔另一方的領土是「爭議地區」（即根據一九六四年邊界談判中交換的地圖雙方邊界線畫法不一致的地區），原則上必須歸還給對方。另外，中共建議雙方應從爭議地區將軍隊往後撤退六十到八十英里。如果蘇聯接受這些條件，中共願意在過去不平等條約為基礎的原則下與蘇聯經由談判全面解決中蘇邊界問題^③。蘇聯對中共的建議一口拒絕，它堅持在進行邊界談判時不應提及任何先決條件，同時，中共更應承認中蘇邊界的不可侵犯性^④。

一九七一年與一九七三年，蘇聯曾一再建議雙方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以及一項規定不以武力解決邊界糾紛的條約，但均遭中共拒絕。一九七八年六月，中共與蘇聯中止馬拉松式的邊界談判。其後，蘇聯曾數次照會中共，希望恢復邊界談判，但中共並未答應。

第三項談判是關係正常化談判。雙方開始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七日，舉行預備會議，十月間正式談判，十一月底結束，預定第二輪談判在北平舉行。不過，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後，中共乘機大做文章以爭取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好感。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張海峰甚至特地召見蘇聯大使謝爾巴可夫（J. S. Shcherbakov）就蘇聯入侵阿富汗一事向蘇聯提出嚴重抗議，要求蘇聯撤出入侵阿富汗的部隊^⑤。接着在一九八〇年一月廿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宣稱，蘇聯侵略阿富汗的行動不但威脅到世界和平與「中國」的安全，同時也對「中蘇關係正常化」造成障礙。因為這個理由，中共乃停止與蘇聯進行第二回合的關係正常化談判^⑥。

註② O. B. Borisov, B. T. Koloskov, *Sino-Soviet Relation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5, p. 242.

註③ "The State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king Review*, October 10, 1969, pp. 3-4.

註④ "Peking and Soviet-Chinese Relations," *Pravda*, April 28, 1976. (in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ol. 28, no. 17, May, 26, 1976, pp. 4-5).

註⑤ "Chinese Vice-Foreign Minister Summons Soviet Ambassador," *Beijing Review*, (January 7, 1980.) p. 3.

註⑥ "Sino-Soviet Talks Inappropriate Now," *Beijing Review*, January 28, 1980, p. 8.

在中共片面停止「中蘇關係正常化」談判以後，蘇聯曾一再要求恢復，但總是被中共拒絕。後來中共宣稱在恢復此項談判以前，蘇聯須先接受三個條件：從外蒙古撤出軍隊並減少在中蘇邊界的駐軍；從阿富汗撤軍；及運用影響力使越南軍隊撤出柬埔寨。²⁵

對於中共所提出的關係正常化三條件，蘇聯並未「具體」辦到，然而雙方卻在今年十月五日於北平恢復副外長級磋商。蘇聯的代表團一行十二人由副外長伊利契夫 (Leonid Ilyichev) 擔任團長；中共的代表團一共十一人，團長是副外長錢其琛。據傳正式談判，可能於不久恢復。

肆、中共與蘇聯恢復會談的動機

中共與蘇聯所以能恢復副外長級談判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由於雙方都有這個意願，如果一方繼續反對，會談怎能恢復？既然雙方都願意，可見彼此都認為有此需要，也就是「有利可圖」。那麼雙方恢復會談後各自有什麼好處呢？欲解答這個問題則應從北平與莫斯科的個別立場來探討。

甲、就蘇聯的立場而言

莫斯科是主張恢復「中蘇」會談最力的一方，其動機可能有以下數端：第一、自從尼克森總統於一九七二年訪問中國大陸以來，蘇聯就對中共與美國關係的進展感到不安。蘇聯尤其厭惡中共所倡議之以美國、中共、日本及西歐為主體組成一個對抗蘇聯的聯合陣線。雖然這個聯合陣線的問題重重，但是蘇聯對美國玩弄「中國牌」的政策確實十分擔心，更因此一再警告美國勿提供現代化武器給中共²⁶。可是蘇聯的強烈反應徒然讓部分西方學者專家相信「中國牌」的功效，認為西方國家應繼續與中共發展軍事關係²⁷。

由於美國顯然並不因為蘇聯的警告而中止與中共發展所謂的合作關係，蘇聯極有可能利用與中共改善關係的手段來破壞中共與美國的戰略合作。毫無疑問的，蘇聯當然知道另外也有一部分的美國戰略專家擔心中共與蘇聯仍然會再度和好。這些

²⁵ *The Strait Times*, November 11, 1982.

²⁶ See: N. Nikitin, "On a Dangerous Path," *Pravda*, January 15, 1980 p. 5. (in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ol. 32, no. 2, February 13, 1980, p. 8.); Vsevolod Ovchinnikov, "Shortsighted Calculations," *Pravda*, June 7, 1980. P. 5. (in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ol. 32, no. 23, July 9, 1980, p. 14).

²⁷ Michael Pillsbury, "U.S.-Chinese Military Ties?" *Foreign Policy*, no. 25, Fall 1975, pp. 50-64.

學者認為，如果中共與蘇聯又合作無間的話，西方國家還再經援或軍援中共豈不自討苦吃？因此，蘇聯不但渴望與中共恢復會談，更一再地表示雙方關係可能正常化，使這派學者的擔心加劇，從而阻擾美國與中共繼續進行戰略合作。

第二、蘇聯在一九七〇年代會利用與美國的和解以掩護大規模的核子武力擴建政策，等到和解結束的時候，蘇聯的核子武力已經迎頭趕上美國。雖然如此，蘇聯也為此付出重大的代價，亦即繼續維持龐大的國防經費²⁸。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最擔憂的就是雷根政府強化美國武力的計劃，因為如果雷根的國防計劃繼續獲得美國民意的支持，除非蘇聯也大規模增加國防預算，否則將無法保持核子武力的領先地位。可是若再增加國防預算則勢必進一步犧牲人民的生活水準並且影響蘇聯在其他方面的建設，這誠然也是個難題。因此，就蘇聯領袖來看，最好的對策便是讓美國恢復與蘇聯的和解，讓美國人民反對雷根的國防重建計劃。就這個考慮而言，蘇聯與中共恢復會談有助於建立追求和平的形象，可對美國輿論造成很大的衝擊，使美國國內支持對蘇聯和解的勢力逐漸增強²⁹。

第三、波蘭問題、阿富汗問題以及可能發生重大變化的中東問題（包括伊朗與伊拉克之間的戰爭）已經讓蘇聯領袖花很多的时间與精力，如果中蘇邊界亦出現緊張的局面，蘇聯領袖將更費神。反之，若與中共恢復會談以緩和雙方關係，則蘇聯不僅可有較充裕的時間與力量來處理東歐和其他問題，並且也可藉着準備從中蘇邊界或阿富汗或外蒙古撤退一部分軍隊的姿態使西歐或日本感到恐慌（西歐害怕蘇聯將把更多的部隊移到歐洲；日本則擔心中共與蘇聯一起對付她）³⁰。利用這個手法，蘇聯便可理直氣壯地要求西歐與日本對蘇聯採取和解政策。

第四、可增強對越南、寮國及柬埔寨的控制。據估計，蘇聯對越南的援助平均每天超過三百萬美元。雖然如此，越南並不見得對蘇聯言聽計從。據報導，越南竟把柬埔寨親蘇的高級幹部撤換，顯然是想防止柬埔寨與寮國被蘇聯直接控制³¹。越南或許認為允許蘇聯使用金蘭灣軍事基地就可以迫使蘇聯繼續支持越南而不敢強行支配越南，但是倘若蘇聯做出要與中共改善關係的態度，越南可就難以抗拒蘇聯的壓力，除非越南願意以對中共作重大讓步而取得與中共的和解。

註²⁸ 據美國國防部的估計，在過去二十五年中，蘇聯的國防經費每年大約都佔全國總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十二到十四。見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oviet Military Power*,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1, p. 9.

註²⁹ 當雷根總統於布里茲涅夫去世後表示願意與蘇聯改善關係，蘇聯領袖，包括新任黨總書記安德洛波夫及總理吉洪諾夫大表歡迎。見 *The Strait Times*, Nov. 20, 1980.

註³⁰ 日本對中共與蘇聯再度友好的恐懼心態，見 Heishiro Ogawa "A Diplomat's View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Asia Pacific Community* no. 17, Summer 1982, p. 101.

註³¹ Nayan Chanda, "The Indochina Linchpi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uary 1, 1981, p. 20.

第五、莫斯科可能企圖利用與北平恢復談判以及改善雙方關係的策略而引起中共內部的政策爭辯，甚或派系鬭爭。據英國學者錫加爾(Gerald Segal)的研究，中共內部對於蘇聯威脅的看法有兩派：一派持悲觀論；另一派則持樂觀論。悲觀論者認為蘇聯擴張力量的主要目標是對付中共，包圍中共；樂觀論者認為蘇聯的威脅是全球性的，並非專門指向中共。樂觀論者較傾向於與蘇聯改善關係，但悲觀論者恰恰相反^⑳。如果錫加爾的分析是正確的，那麼蘇聯與中共恢復談判是有可能加劇中共內部的爭辯。

乙、就中共的立場而言

中共所以願意接受蘇聯的建議恢復談判而不顧自己一直堅持的關係正常化三先決條件，其動機當然不單純。就各方面觀察，中共願意與蘇聯恢復談判可能有以下數種動機：第一、重新建立中共在第三世界的發言地位。中共自從在一九七〇年代與美國進行和陸政策以後，由於急着想討好美國，曾引起第三世界國家的不滿。譬如非洲的國家在安哥拉內戰中大都支持獲勝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The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 of Angola，以下簡稱MPLA)，但是中共卻與美國站在相同立場拒絕支持由該組織建立的政府，認為該政權僅僅是蘇聯的傀儡^㉑。後來美國的福特政府因為受到國會的壓力不再允許中央情報局支助反對MPLA的「安哥拉完全獨立舉國聯盟」(The 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mplete Independence of Angola，以下簡稱UNITA)，然而中共依舊繼續支助UNITA，弄得自己孤立自己。今年九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曾宣稱「社會主義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中國同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具有相似的苦難經歷，面臨共同的問題和任務。中國把堅決同第三世界其他國家一起為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而鬭爭，看做自己神聖的國際義務」^㉒。胡耀邦的報告說明中共今後將試圖擔任第三世界發言人的角色。可以想像得到的是，中共在今後有關第三世界事務上與美國唱反調的可能性將較以往增加。

第二、爭取在華盛頓、北平、莫斯科三角關係中的主動地位。中共在一九七〇年代打美國牌固然有助於嚇阻來自蘇聯的軍事威脅，不過過度接近美國的結果則使得中共在三角關係上處於被動的地位^㉓。換句話說，由於老是玩弄美國牌，久了以後就要被美國帶着走，否則美國一旦生氣，中共的美國牌不就飛了？反過來說，如果中共稍稍與蘇聯改善關係，中共不就多了一個選擇嗎

註⑳ Gerald Segal, "China's Security Debate," *Survival* vol. 24, no. 2, March/April 1982, pp. 68-70.

註㉑ 中共在今年九月宣佈承認安哥拉政府。

註㉒ 新華社〈北平一九八二年九月七日電〉。

註㉓ Michael Yahuda, "China and the Great Power Triangle," in *The China Factor*, edited by Gerald Segal,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1982, p. 42.

？與其被一個超級強權爭取，不如同時被兩個超級強權爭取。

第三、希望從美、日等西方國家獲取更多、更優厚的經濟援助乃至軍事援助。儘管北平在過去十一年中一再呼籲美國、日本、西歐與中共組成反蘇的聯合陣線，可是這些國家的表現卻讓北平大失所望。美國等西方國家雖然懼怕蘇聯的擴張政策，並且也在外交場合上數次與中共聯手，一起對付蘇聯，但是在西方國家中即使是美國也不希望與蘇聯的關係惡化到無可挽救的地步。以雷根總統為例，雷根確實十分厭惡蘇聯的對外擴張行爲，不過他仍然沒關閉與蘇聯改善關係的大門^⑤。當然，更令北平感到沮喪的是，美國等西方國家一方面說是重視中共在全球反蘇戰略上的貢獻，另一方面卻不願意提供大量經濟援助給中共。美國國會的拒絕把中共當作一個友好的國家以及雷根政府的擱置與中共的核子能合作協議，只有添增中共的不快^⑥。爲了脅迫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共提供較多較優厚的經援乃至軍援，北平於是採取美國政府最害怕的對外政策——與蘇聯再行勾搭，企圖利用打「蘇聯牌」對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討價還價。

第四、中共瞭解若中國大陸實行自由化經濟制度，它就將難以維持對大陸人民的統治地位。爲了維護「黨」的領導權，北平寧可師法蘇聯的經濟制度而不願採行可救國但「亡黨」之危險途徑。就師法蘇聯的經濟制度來說，中共需要與蘇聯稍稍改善關係並增加雙方接觸以便進一步瞭解蘇聯^⑦。

第五、中共可以藉着願意與蘇聯改善關係的策略迫使蘇聯表態。如果蘇聯真的對中共作出具體讓步，中共是佔了便宜；反之，如果蘇聯不作實質上的讓步，沒有「行動」上的表示，中共便可以振振有詞地數說蘇聯的不是。

第六、今年九月一日，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開幕詞中曾揭示中共在八十年代的三個主要任務是：（一）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二）「爭取實現包括臺灣在內的祖國統一」；（三）「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鄧小平的報告說明中共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如何完成四個現代化工作。爲了能有較多的時間與人力、物力來從事四化建設，中共需要一個比較穩定的國際環境，特別是一個穩定的中蘇邊境。因此與蘇聯改善關係或至少與蘇聯敷衍一番都是有益的。

第七、中共正在進行的四化建設不但需要增建新的企業，也得改善既有企業。由於蘇聯在五〇年代會幫助中共建設兩百多個工業項目，包括化學廠、發電廠、拖拉機廠及汽車廠等等，這些俄製的工廠設備大半已經需要改進或更換設備。與蘇聯改善關係

註⑤ Ronald Regan, "East-West Relations: Reduction of Nuclear Arms, May 9, 1982," in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vol. XLVIII, no. 16, (June 1, 1982), p. 484-485.

註⑥ 有關美國擱置與中共的核子能合作協定一事，見 *The Strait Times* September 20, 1982. 至於美國國會對待中共的立場，見 *The Strait Times*, May 7, 1982.

註⑦ 參見尹慶耀「十二大後的中共對外政策」〔問題與研究〕第廿一卷第一期，第五頁。

、增加雙方貿易可以幫助中共獲得這些俄式工業項目的補充設備或零件。此外，中共也可以從蘇聯以貨易貨地進口棉花、木材等原料。

第八、中共原希望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以後，美國將會停止對中華民國出售武器，以便困擾中華民國，可是這項希望既未在卡特政府期間實現，也不為雷根政府所接受。爲了對美國政府增加壓力，中共可能利用「蘇聯牌」，增強美國國內主張保持「中國牌」專家的聲勢^{③9}。

第九、鄧小平的親美外交並未爲中共帶來明顯的好處，中共內部因而有反對再繼續依賴美國的主張。爲了減低這一派人物的反對聲浪，鄧小平自然要改變對美策略，開始與蘇聯恢復對話^{④0}。

總之，北平與莫斯科都有足夠的動機與理由來恢復雙方的會談。儘管這些動機相似者少相異者多，但因彼此都想利用會談以圖一己之利，雙方也就真的談起來了。

伍、未來展望

中共與蘇聯雖然已經恢復面對面的對話，並且雙方都宣稱希望改善彼此間的關係，但這僅僅是一種外交策略，目的都是想藉着談判的恢復而獲得利益。因此即使談不出具體的結果，只要雙方認爲仍然有利利用價值，談判就將繼續下去。

在蘇聯方面，雖然一再主張恢復與中共談判的布里茲涅夫已經死亡，他對中共的政策預料仍將爲其繼任者——安德洛波夫所遵循。理由很明顯，與中共改善關係不但符合蘇聯的國家利益並且有助於安德洛波夫鞏固對克里姆林宮的控制權。此乃由於安德洛波夫剛上臺，不太可能立刻就掌握真正的大權，爲了對付權力的挑戰者或反對勢力，他必須把大半心神花在人事的安排以及如何確保自己的領袖地位上面。在這種情形下，安德洛波夫格外需要一個較爲穩定的國際局勢，包括一個平靜無事的中蘇邊界。否則一朝面臨多方面的緊張情況，他極可能一時應接不暇而予國內政敵有機可乘。事實上，如果仔細觀察蘇聯自一九一七年以來的外交政策，我們可以發現剛上臺的領導者在未鞏固權力之前都較傾向於採取溫和的對外路線。

至於中共與蘇聯是否因爲恢復談判而有和解的可能，筆者的看法是可能性很低，不過雙方稍稍改善對立的關係倒是極有可能

註^{③9} 美國國內的確有專家學者認爲中共所以與蘇聯接近完全是由於「臺灣問題」的緣故。見·Takashi Oka. "US-China Ties in the Doldrums Over

Taiwa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ember 12, 1982; Golam W. Choudhury, "Development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sia Pacific Community*, no. 17, Summer, 1982, pp. 103-115.

註^{④0} John Coppe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Reaching a Plateau," *Current History*, vol. 81, no. 476, (September, 1982), pp. 243-244.

。當然如果任何一方完全接受另一方的要求，和解一定是可能的，祇是這種情況幾乎不存在。具體的說，即使雙方都暫且擱置難以解決的邊界問題，中共與蘇聯依然不容易在關係正常化方面達到突破性的進展，畢竟蘇聯對中共的讓步將是十分有限的。

先就阿富汗問題來說，除非蘇聯能確信目前親蘇的阿富汗政權能夠有效地統治該國，蘇聯的軍隊並不可能因為中共的要求而從阿富汗撤退。關於這一點，蘇聯的立場十分清楚，那就是要等到反蘇聯的阿富汗游擊力量被消滅後，蘇聯才會從阿富汗撤軍。試問中共願意坐視蘇聯清除阿富汗的游擊隊而不予以支援嗎？可以肯定的說，爲了中共自己的利益並且爭取回教國家，中共仍將支持阿富汗的游擊隊。

其次，蘇聯也不可能從外蒙古撤退所有的部隊。外蒙古的戰略地位對蘇聯與中共都十分重要，誰控制外蒙古誰就佔有較優越的國防地位。當年史達林所以千方百計的把外蒙古置於蘇聯的控制下，一方面是替蘇聯的安全設想，另一方面則是爲控制中國做打算。因此中共要求蘇聯從外蒙古撤軍無異是要求蘇聯開放一個國防缺口，任何蘇聯領袖都將難以答應。

再就柬埔寨問題而言，蘇聯或許願意勸告越南從柬埔寨撤出軍隊以便改善與東南亞國家協會的關係並對中共的要求做一番敷衍，但是蘇聯並不敢壓迫越南就範。因爲越南如果一旦與蘇聯鬧翻而拒絕讓蘇聯的海空軍使用金蘭灣等軍事基地，蘇聯在東南亞的戰略地位將一落千丈（蘇聯在越南的基地不僅大大地增強其太平洋艦隊在南中國海與印度洋的作戰能力，也強化包圍中共的戰略），基於這種考慮，蘇聯是不會輕易與越南鬧翻的。

中共與蘇聯比較可能獲得一點具體協議的是雙方都從彼此邊界撤退一部分軍隊。蘇聯可以把這些撤退出來的軍隊遣往阿富汗對抗阿富汗的游擊隊，等到解決阿富汗問題後再從阿富汗撤退，這是一個很好的策略，但卻與中共要求蘇聯從阿富汗撤軍的條件相違背。當然蘇聯也可以把部署在中蘇邊境的部隊往後撤退一部分，這樣或許可爲中共接受（蘇聯若把部署在中蘇邊界附近的軍隊撤退一部分而移駐歐洲地區，中共一定最歡迎），唯一麻煩是必須在惡劣的環境下建造許多營房。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蘇聯祇可能有限度地接受中共所提出的關係正常化三條件。因此縱使雙方關係稍獲改善，但衝突的根源仍然繼續存在，互相猜忌、互相爲各自利益打算的心態也將難以去除。如果美國等西方國家爲了怕失去「中國牌」而對中共提供更多更優厚的經濟援助乃至軍事援助，那祇有正中中共玩弄「蘇聯牌」的圈套。

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完稿